

作者簡介

李春陽，又署春陽，文學博士。任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治中國近現代學術思想史與漢語修辭，習字作畫，寫詩，愛好古典音樂。

曾發表論文《什麼是白話文運動》，《二十世紀漢語的言文一致問題商兌》，《漢語歐化論》，《古文與科舉》，《簡化漢字不該倉促而行》，《白話文運動中的周作人》等。另有《〈詩經演〉注》與《長途跋涉後的歸真返璞》《摘花高處賭身輕》《不與時人論短長》等藝術評論。本書係作者的第一部學術專著。

提 要

百餘年前，中國的文章多以文言寫就，雖然白話文從唐宋之後作為書面語的一種不可忽視的補充形式廣泛應用於小說、戲曲、語錄等寫作領域，但沒有取得社會地位。二十世紀初的白話文運動，作為現代中國的文體革命，致力於書面語的再造，這一運動的發起人是胡適，最高成就體現為魯迅和周作人的白話寫作，而影響最大者是毛澤東的文體。

國語運動和新文學運動事實上以新文字運動為起點和最終的目標。三位一體的新文化運動，本質上是一種政治運動，現代民族國家的重建，是其最高宗旨。語言運動和文學運動，乃是服務於此宗旨之工具。統一國語和言文一致，作為國語運動的兩大目標，在新文字之中才能夠完全實現。而歷史表明，新文字從學理上講是反科學的，從政治上講，是分裂民族國家的，從文化上講，是割斷歷史的，也是不可能實現的。漢語和漢字的關係幾千年來水乳交融，被漢字塑造出來的漢語，無法以拼音代替，識字艱難，改成拼音文字容易普及教育乃是欺人之談。

傳承民族文化的歷史使命，並不低於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為了所謂的國家利益要犧牲數千年的文化傳統麼？錯誤的文化政策，源自歷史虛無主義的激進主張，意識形態的偏見。白話文運動受其蠱惑，追求言文一致，向大眾語方向疾馳，一邊講文藝的民族形式，一邊積極宣導廢除漢字、走拼音化道路。漢字的倉促簡化，文言教育的普遍不足，公民在接受過普通高等教育後不具備閱讀典籍文獻的能力，使我們幾千年的文化傳統第一次面臨失傳的危險。文言的退場，加深了傳統價值的崩解，而白話文的盛行，並不意味著新的知識和價值的成功建立。語言文字上的變革，牽動著社會生活各種矛盾衝突，承載著百多年來中國社會現代化整體運動的方方面面，同上至領袖下至百姓的每一位個人關係極為密切。

本書以百年來文言、白話之間的消長起伏為線索，通過對於清末文字改革運動、五四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民族形式論爭等系列史實的清理，全面檢討書面語革新和文體建立上的成敗得失，對於漢語書面語發展的重大問題，比如言文一致、漢語歐化、新舊白話、新詩舊詩、標新立異等，有專章討論。本書以修辭思維的拓展、寫作倫理的重建為旨歸，本書認為白話文運動的危機，暴露了漢語寫作和現代中國在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上的巨大困境。

在作者看來，中國文化的異質性，集中體現於漢語和漢字的異質性上。這可能是我們接納世界主義或西式普遍主義的最大難題，也是當今世界文化多元的真正表現。弘揚民族文化的前提，是深入地掌握和精通自身的語言和文字，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對於民族文化的精華有所繼承。由於白話文運動的巨大影響，我們至今還在接受不完整的漢語教育，報刊電視等各種媒體的語言水準普遍較低，書面表達能力不足，缺少修辭意識，是這一語言教育的必然結果。假如想改變現狀，有必要從反思白話文運動開始。

序

蔣 寅

本書是對二十世紀白話文運動及其影響的一個全面反思，是對這一重大學術課題的再度深入考察。我們都知道，對白話文運動的評價是與運動相伴而生的一個老問題，一個世紀來論者之多，如過江之鯽。但篇幅如此龐大、視野如此開闊的論著似乎尚未出現過。作者的觀點很清楚：白話文運動初衷是提倡白話文，但結果卻導致文言文被廢棄。作者在今天為文言申冤，不是反對白話，而是要重新確立文言在語文教育中的地位，彌補白話的不足，有益於白話的成長。一句話，白話的發達、成熟、偉大，不必以文言的廢棄為前提。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應該說是很理性的看法，是涉及民族語言發展方向的重要觀念。

這些觀點在作者李春陽二零零九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即已表達。論文答辯時，蒙劉夢溪先生錯愛，以同行專家評審相囑，實則我對新文化運動和語言學夙無研究。但接到論文，閱讀之下深獲我心，覺得鬱積多年的骨鯁，都快然一吐，不由得為之振奮。

關於白話文運動的興起，近年的研究較以往已有較大突破，愈益注意到晚清社會生活的變革及其影響，這對理解白話文運動的社會基礎無疑是很有幫助的。但白話文運動的理論核心——言文一致的假說，是無論如何繞不過去的石頭，本書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討論這一問題。就我所知，言文一致大概從來就是個神話，在語言史上得不到證實，就是拼音文字也絕不等於言文一致。問

題的關鍵還不在這裏，即便有過言文一致的情形，又能怎樣？

海納川《冷禪室詩話》載傅山與其子眉一筭云：「老人家是甚不待動，書是兩三行，眇如膠矣。倒是那裏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漢都坐在板凳上，聽甚麼飛龍鬧欄，消遣時光倒還使得。姚大哥說十九日請看唱，割肉二斤，燒餅煮茄，僅足受用。不知真個請不請。若到跟前無動靜，便過紅土溝，吃兩碗大鍋粥也好。」這是清代初年的家常書筭，一如父子對面，娓娓道來，最近口語，足見當時口語已與今天相去不遠。如果這便是言文一致，又能說明什麼問題呢？白話文運動的目標不是要記錄口語，而是要創造一種用口語寫作的文學。單純口語的記錄，是不足以成爲文學的。這原本是個常識，但在那一味思變的年代，人們似乎忘忽了這一點，以爲文言改作口語便是進步。三十年代官方刊發一則何應欽的消息，指定題目爲《何省長昨日去嶽麓山掃其母之墓》，第二天被報人改作《何省長昨日去嶽麓山掃他媽的墓》！

如果說這不屬於文學的範圍，那麼民初陳景寔《觀塵因室詩話》還有一個有趣的例子。陳氏舉杜甫《詠懷古蹟》「群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聯，說寫成新詩必作：「這一大些山頭和那些山澗溝子一齊都對荆門，路傍邊有一個小村子裏頭有一位美貌的佳人。」白話倒是白話了，但能否被視爲文學呢，還要打個問號。當然，今天誰也不會將如此幼稚的白話視爲文學語言變革的成功。經過幾十年，現代漢語寫作早已度越童稚年代，具有相對成熟的品格。但是，要確定白話文學的評價標準，判定其得失，恐怕還爲時過早。正像現代性是個未完成的過程，在一個時期被視爲驚天動地的變革，隨著過程的推移，其權重會逐漸變輕。語言也同樣如此，改革之初，難以預計未來的發展。相比當今「新新人類」的火星語言，清末民初的文白之變，似乎又不算很大的詫異了。然而無論如何，棄置數千年累積的語言藝術和文化傳統的沃土，徒手白戰，想在貧瘠而日常的白話荒原上創闢一種偉大的新文學，肯定不能說是一種明智的想法。

不是沒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學衡》雜誌的簡章中有「體裁及辦法」一項，出自吳宓手筆。其辭曰：「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爲學究，尤不敢故尙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學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故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這樣的態度，即便在今天看來，仍然可以說是睿智而不失自信的。文學不同於日常說話，即與學術論文相比，它也是一種更講究修辭的雅言。漢語文學絕不可能以放棄甚至犧牲漢語固有的優美形質為代價而獲得成功。哪怕這種盲目的勇氣可能成為流行的症候，哪怕其幼稚的實驗成果可能風靡一時，但歷經時間的淘汰，終究會在閃耀著漢語優美形質的古典作品面前黯然失色。

一百多年前，阮元在《文言說》中寫道：「為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註1〕這通常被視為替駢文辯護之辭，不知它實際上是近代社會來臨前夕，一種堅守漢語形質之美的文學態度，也可以說是文學史上保守主義的前驅。余英時認為中國沒有保守主義，因為沒有可以保和守的東西。他似乎未注意到晚近以來一部分文化人的想法。

事實上，面對白話文學的興起，也曾有人用另一種思路來設想文學的未來。比如未被劃入學衡派而實為派中人的李審言，就對阮元的《文言說》「尤所心醉」〔註2〕，在「白話詩出，為大革命」的形勢下〔註3〕，思量著要走出一條能發揮漢語形質之美的路，並自信堅守阮元自命的「子派雜家」之學〔註4〕，據以為詩文，未嘗不能有所成就。他對古文辭偶儷傳統的張揚，實在是出於現實中對傳統文學審美特質淪喪的恐懼。其保守主義的立場至今仍是值得我們尊敬和反省的。然而，「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在那個時代，沒有人會將李審言們的想法認真掂量一下，他們微弱聲音最終淹沒在白話文運動的強勢洪流中。如今看來，白話文運動最根本的問題，不在於放棄文言本身，而在於它同時斷絕了其他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反思白話文運動的得失，確實是關涉現代文學、文化轉型與中國未來文學、文化發展方向的重大問題。

當然，受語言學知識的局限，尤其是在計算機漢字處理技術發明之前，白話文運動的鼓吹者和實踐者們對漢字和文言的悲觀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今天，

〔註1〕 阮元《學經室三集》卷二，中華書局1993年版，下冊第605頁。

〔註2〕 李審言《與錢基博》其二，《李審言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下冊第1050頁。

〔註3〕 李審言《與陳石遺》其一，《李審言文集》，下冊第1041頁。

〔註4〕 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學經室三集》卷二，下冊第609頁。

還有人出於語言的自卑，而導致董樂山說的「漢語的自我殖民地化」，那就肯定與漢語教育的失誤有關了。從決定一種語言諸多基本特徵的音節數量說，漢語在所有語言中居中等水平，學習難度大致也是中等，並不比學習許多語言更困難。這一點當年文廷式與李提摩太辯論中文的繁簡問題，即已闡述得很明白：

西人李提摩太，嘗謂中國文繁，余應之曰：中國文不繁。李提摩太請其說，余告之曰：西人拼音，凡數萬音。而中國所用之音，不過數千。此簡一也。西人字典不下十萬字，其常用之字亦將近萬。而中國所有之字，除別體詭體外，不過一萬；所常用之字不過四千。其簡二也。且數千之音，大半分以四聲，道之語言，則平、上、去三音不甚分別，是音尤簡矣。各國語言凡觀字餘音皆著之筆畫。中國則以數虛字形似之，而一切起音、收音概置不用，此所以簡而足用也。問曰：然則中國學童每至七八年、十年，猶有文理不通者，其故何歟？余曰：此求工求雅之過，非文字之咎也。中國文法，大半沿之周、秦、漢者十七八，沿之唐、宋者十二三。若近千年之名物則不登於文字，近五百年之語言則不書之簡牘。是學者讀古書，通文理，其中已兼兩次翻譯之功，安得不迂緩乎？且閭里之女子，鄉井之細民，但能閱戲文、看小說，不一二年，便可親筆寫家信。若謂非十年不可，豈此等人之聰明轉過於在塾肄業者乎？故但令識字能書之後，即改學化學、算學等藝，度其用文字之功，雖至愚之人，三年，無不能操筆記事者矣。以是言之，不必再造簡便文字也。〔註5〕

若從數千年不斷的歷史和強大的構詞能力來說，則漢語毫無疑問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語言之一。不僅擁有數量最豐富的詞彙，而且它強大的構詞能力足以消化任何外來語，這只消看看漢語可以不用音譯法來吸收任何外來語就知道了。很多語言都做不到這一點，最爲我們熟悉的例子是日語。

因爲有了比較語言學，讓我們知道，漢語是世界上最簡潔的語言。聯合國使用的文件，漢語本是最薄的，若用文言還會薄許多。當年黃季剛先生講課，盛讚文言的簡潔，因胡適提倡白話文，便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家人

〔註5〕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中華書局1993年版，下冊第804頁。

電報必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需要十一個字。文言只需『妻喪速歸』四字，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在白話文犧牲掉這種簡潔性後，我看到日本店鋪「年中無休」的牌子，竟不覺有禮失求諸野的感慨，國內通常寫的是「節假日照常營業」。

讀完春陽這部書稿，覺得她許多想法都與我不謀而合。比如她說：「就掌握白話、文言的一般情況而言，前者易而後者難，國家的教育政策當應先易後難而循序漸進，決不可捨難就易而自甘淺陋。」我也認為，一個人要想學好漢語，寫好語體文，首先必須學好古漢語。林琴南說「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確為至理名言。我甚至認為，中學語文課就可以不教白話作品，只讀文言。白話自幼使用，到了中學就不用再學，自己閱讀文學作品即可；而文言則需要花時間來學習，一旦學好，自然提升語文水平。看港、臺電視節目，日常措辭明顯比大陸文雅。臺灣電子通訊產品的廣告會說「無遠弗屆」，警察調查交通事故現場，面對電視鏡頭，會說「事主已往生」。想想我們一般會怎麼說？

讀春陽還在修訂中的書稿，的確給我很多觸動，很多啟發。對一個涉學未深的年輕學者來說，駕馭如此重大的課題，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膽識的，更需要具備相當的學養、才能。我覺得春陽不僅表達了自己的想法，還表達得很有力。第一章對《中國大百科全書》「白話文運動」詞條的逐句解讀和評點，便頗見功力，澄清不少似是而非的不確論斷。眾所周知，《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纂曾集合了各學術領域的專家，但受當時觀念和學術積壘的局限，論述中還是存在不少問題。經春陽一番分疏，其失實和不嚴密之處一一暴露出來。第二章逐個剖析白話文運動中的五位重要人物，讓我們看到周作人、廢名、李長之他們對文言、白話與新文學關係的認識，其實都是很通達而妥帖的。隨後她又梳理了現代白話文運動涉及的「大眾語」、「民族形式」、「整風」、「文革語言」、「幫八股」、「言文一致」、「歐化」、「翻譯的白話」等一系列概念，並將這些時尚話語背後的文化焦慮和意識形態背景作了詳盡的剖析。貫穿於其中的歷時性眼光，不僅有文化批評的視野，也不乏歷史反思的深度。

當然，我同時也感覺到，作者對白話文運動乃至文學語言變異的合理性，似乎估計不足。文學本質上就是一種語言的遊戲，故而決不肯屈從於日常語言。賈平凹的小說語言就是商洛方言嗎？不是，是商洛方言和《水滸傳》式的明清

白話的混雜體。網絡文學更充斥著改造日常語言習慣的縮略、錯位、雙關等各種語言花招。這本是後現代寫作的一種常態，也是網絡掙脫意識形態束縛後的自然反應，但春陽似乎出於對語言純潔性的理想，而明顯持否定態度。這或許與個人趣味有很大的關係。她說魯迅、周作人而外，幾乎所有白話作家的創作，都不能令她滿意。周作人我從來不喜歡，讀得很少，無法評論。但魯迅我還是熟悉的，並不覺得魯迅的白話怎麼好，非但文白夾雜，還帶有濃厚的日語語法痕跡（這也是當時留日文人的通病），現在看來仍是現代漢語初期較為幼稚的白話。我的判斷也可能比較主觀，難得專家首肯。但文學評價原本與批評者的知識背景有關，許多人稱讚金庸的語言好，文史知識淵博，而在我這個古典文學研究者看來，金庸小說的語言有點粗糙，文史知識也一般，他真正的本領乃在奇幻的想像力、駕馭複雜情節的魄力和刻畫人物的功力。

這些問題都容有討論，但有一點似乎值得作者注意。我在閱讀中不時感覺到，作者才氣橫溢，而且急於表達平時積纍的有關歷史人物和文化問題的許多想法，寫著寫著就跟隨史料議論開去。胡適、魯迅等五位先賢，本來只須討論他們與白話文運動的關係，最終都寫得近似作家論。這是作者需要斟酌的問題，但在我們讀者，固不妨將這部著作當作中國二十世紀的語言文化史來讀。語言原是文化最基本的載體，在語言中發生的一切都密切關係著我們的生活。這一點，對經歷「史無前例」的語言洗禮的我輩來說，再容易理解不過。

轉瞬四年過去，春陽的書稿經反覆修訂，行將授梓，春陽遂囑我為新稿寫個序。本來我既無能力評價她的研究，也不足為她的大作增重，既承重囑，祇好聊陳管見以塞責，不想一氣寫了五千字，大概也是有感而發罷。春陽和讀者們覺有不妥，自可一笑置之，不值得指正的。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於花蓮

讀李春陽白話文運動史話

陳丹青

一國之語言文字，其語文亡者，則其國亡，其語文存者，則其國存。
語言文字者，國界種界之鴻溝，而保國保種之金城湯池也。

以上這番話，是晚清官員鄧實所說，文言句式，不難懂。逾百年後，中國沒有亡，而且正在崛起；漢字迄未廢除，由繁體而簡體，仍在使用的。中國的「語文」則發生空前巨變：文言文早經廢棄，現代語文一律是白話文，能讀古文者，固然有，但恐怕沒人再如鄧實輩這般思維而說話了。

這樣的「中國語文」是怎樣一種語文？由這語文而言說的中國，是怎樣一個中國？

語言亡失繼而亡國的古例，並非沒有。鄧實說這話，時在國難逼近之際，朝野救國，議論滔滔，他獨取「語文」一節而發此危言，不知當初獲致怎樣的應和。百年迄今，救國強國的無數實踐多半奏效，或在試圖奏效的路途，其中，始于民初的白話文運動及其後果，則要比其他革命——國體、政治、經濟、科技、文藝——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來得更為深刻、更為久長、更難評估。

李春陽女士《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似在回應鄧實以上這番話。昔鄧實以五十六字出之，本書逾六十萬字——前年、今年，我居然逐字通讀了兩遍，其中布滿許許多多我所不知道的掌故與識見，更有我大欠明白的道理在。我願以這

篇序言感謝李春陽。

白話文運動、文化激進主義、五四啓蒙的政治化、文言傳統的喪失……這些詞語，我平時隨口說、隨手寫，自以為歷史的是非早已清曉。讀過這篇詳詳細細的賬，這才知道我于白話文運動，及其今日白話文的種種來歷，根本不知道。

零碎的例，太多了。譬如，白話刊物的初起，遠自清末，主事者大抵是洋人傳教士，並非始于民國初年那場白話文運動；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即訓令全國初級小學改「國文」為「國語」，「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雖說形同空令，究竟是官府的文告，並非一班書生鬧運動；白話文運動的目標是「言文一致」，首倡者，想當然耳，胡適之、陳獨秀，其實有言在先的卻是晚清的黃遵憲；而在魯迅提議年輕人「少讀，或不讀中國書」之前——至少早了近半個世紀吧——吳汝綸就扔出更為決絕的話，說是除了一冊《古文辭類纂》，中國的古書一概不必讀……

這等事情，我從來不知道。

除了陳述白話文運動的原委，本書持續接引語言學觀點，與白話文運動的史料時相穿插，層層揭示運動的內因、外因、遠因和近因。如古代開科取士與文言文的關係，近世廢除科舉與白話文的關係，孫中山的立國「五權」何以特設「考試權」，周作人為什麼以「十二分的誠意」提請給大學生排幾課「八股文」，這些，我都不知道——當章太炎為漢語漢字嚴正辯護，同期，結構主義語言學祖宗索緒爾在巴黎開課，章太炎也完全不知道——至于什麼是漢語的「字本位」，什麼是印歐語系的「音本位」，什麼是漢語書寫的「意」和「象」，什麼是八股文的「破題」與「束股」，什麼是「義理」、「考據」、「詞章」，什麼是唐宋八大家，什麼是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我原本不知道，略微知道的，也不甚了然，現在由作者領著一路讀下去，這才望見白話文運動鬧起來，或故意、或無意，處處和語言學發生大錯位。當初，新舊文人對文言文的辯護有理有據有遠見，從胡適陳獨秀魯迅那邊看過去，莫不是強詞奪理的混賬話，如今遠隔是非，始得看清強詞奪理之輩，反倒是五四運動的健將和大佬。

李春陽是要來質疑啓蒙前輩麼？不是；是為清末舊黨抱屈麼？也不是。通篇讀下來，李春陽的工作，就是方方面面一五一十告訴你：白話文運動的前前

後後，哪些關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哪些人物當時說了什麼話，哪些文本針對什麼問題，哪些問題被什麼緣故或支離、或利用、或完全掩蓋了……所有這一切，據實說，我一概不知道。

我樂意公布我的不知道。我亟願確信：當今若干文學教授、語言學家和歷史學者，應該知道；眼下的密密麻麻的文科研究生，也該大約知道的：但以上細故，僅僅關乎知識？白話文運動，只是語言專業的學術課題嗎？

我對本書的深度認同，大約以下幾點：一、材料的看法與用法，超越學術。二、大規模犯難，難度可驚，勇氣尤為可驚。三、對傳統中國語文，耿耿摯愛——沒有這份摯愛，僅著眼于史料與學術，不可能有這部書。

先說第一點。

本書成稿，歷時五年，初稿二〇〇九年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我初讀，即有感于作者對中國語文的命途與是非，異常敏感，且于歷來研究白話文運動的文本，顯然早經追究；而茲事體大，論者累累，倘非長期浸淫大量史料，反覆辨讀，不可能是這等審慎而富野心：此是書寫論文最可寶貴的狀態。

白話文運動的起止，大致是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按論文通例，此一時期的重要材料均被收入，鮮有遺漏——包括部分啓動的所謂大眾語、世界語、拉丁化新文字等等改革，及這一過程中的著名論爭——幾乎是運動史料的一覽表。但這份一覽表僅占全篇史料十之二三：作者的史識遠過于此。就我二度閱讀的記憶，不斷不斷使我開眼而此前無緣一見的文本，遠比民初白話文運動的已知史料，更具歷時感與說服力。

撮要說來，大幅擴增的材料是：

一、官方文本。包括北洋政府、民國政府和新中國政府的明令、文告、社論、專著、辭典、批判稿、會議文件、政策條款等等。

二、一改相關研究歷來聚焦民國的舊例，一九四九年後涉及語言改革的大事記，包括重要文獻、發布年份、執行機構，從事研究或制定語言政策的人物等，多所記存。

三、議論白話文問題的人物身份，大幅擴充，包括革命家、哲學家、史學家、美學家、翻譯家、官員、詩人、書畫家、文藝評論家，甚至烈士遺屬、中小學生、老百姓。至此，「白話文運動」的主角與焦距，易為「白話文」本身。

四、國家，及國家首腦對語言改革的強度介入、長期掌控，可能首次被納入白話文運動研究，時段跨越七十多年，歷經延安時期、內戰時期、新中國成立後、文革、後文革迄今。其中以毛澤東及中共高層的相關指示與宣傳，為最重要。

五、白話文運動著名文本之外，百餘年來的大量白話文文本，包括晚清、民國、共和國迄今的各種公文、作文、小說、詩歌、發言、辯論、通信、雜誌、俚語、方言、網民語言……總之，以往同類研究僅限于文字學、語言學與文學創作的材料範圍，至此擴充到白話文被及的幾乎所有層面。

至此，李春陽打通學科，串聯古今，將白話文運動被長期支離的歷時性與影響面，完整還給了白話文，白話文運動的語言問題和歷史問題，終告合流；白話文研究的方法、觀念，為之一變，白話文研究的歷史視野，為之大開，白話文運動被一舉帶出五四語境——同時，也被全方位置入長期支配這一運動的歷時情境——進入遠為龐大的領域。在被白話文全面覆蓋滲透的所有領域中，白話文運動漫長遍在的後果（包括無法預估的前景），可能首次——至少，以此前未便點破的要點——被置于權力的景觀。

這是一篇不憚其繁，事事處處以材料組構敘述的論文。所有擴增的材料，為白話文一案展開全新的證據，其說服力，即在揭示了中國現代政治與白話文運動的關係。這一關係的公然呈示，终于在白話文史料與中國現代史之間，清理出一整條錯綜複雜而清晰可辨的因果鏈。自白話文運動大面積失控到深度質變的全過程，初告揭示：當年這場語言運動設置的種種話頭，日後，幾乎全部坐實為不折不扣的政治命題——換言之，迴避政治，無以談論白話文運動。

在已知的白話文運動研究中，「政治」，以及政治的歷史作用，照例被審慎帶入，作為背景，作為曖昧的補充，和語言問題區隔處理，以安全的距離織入理論性評述；但在本書中，每一份材料呈現為政治的，同時是語言的自供狀，閱讀全篇的過程，即是語言如何作為政治、政治如何成為語言的呈示過程：以遞進的，漸強的方式，李春陽使擴增的材料源源提供了一組又一組政治真相：這些政治真相的每一部分，每一個面，體現為語言——就是語言。

是故李春陽的材料不再只是材料，而是白話文運動政治性格的自行敘述。經審慎調理後，各種文本的政治性或從語言表層凸顯，或使語言的真問題從政治話語中被剝離，而後，同步植入本書的多聲部結構，甚至，成為主唱：論文

的章節，由此清晰，並予確立。

譬如，據材料的類別與類比，劃分專章（如「破除文言白話之執」、「漢語歐化問題」、「新舊白話問題」等等）；追蹤材料的要義和疑點，焦距專題（如「白話偏至論與兒童八股」、「現代翻譯問題對白話的影響」、「從張恨水到張愛玲與趙樹理」、「魯迅與毛澤東文體的差別」等等）；利用材料的對立或關聯，顯示異同（論及翻譯問題一節，《天演論》的嚴復文言版與後世的白話譯文，兩相對照；論及「毛文體」一節，毛澤東二十六歲、三十三歲、五十多歲的文言稿件和白話文，前後對照；文革後以文革語言批判文革的材料等等）。如此，白話文與白話文運動，該運動與政治、歷史、語言學等等過于複雜、專業或非專業的種種關係，被所有材料的語言性能，彼此照亮——此前，這種語言性能未被發掘、未予彰顯——並躍出材料，與本書形成交相辨識、彼此辯難的互文關係，所有材料于言事之際，同時便在說理。

論文的材料部分，通常枯燥乏味，以我有限的閱讀，此前鮮少在論文中遭遇如此富有活力的材料：在其他命題的論文中，本書與材料大致處于從屬關係，在李春陽這裏，材料就是語言，作者的見解和材料中的見解，彼此出入，與本書不相區隔。我不願說，這是一種敘述的策略——任何策略不免傾向選擇的偏見——毋寧是紛繁的材料導引李春陽步步窺見白話文運動的驚人的輕率，在在觸探政治和語言、語言和政治的雙重陷阱：經由大量史料的反方向跋涉，李春陽詳細清理了白話文運動的斑斑後事，以一種並非意在理論的論辨方式，詳實估算白話文影響的是非凶吉：理論不可能凌越語言，理論就是語言，是語言政治之一。面對理論的語言和語言的理論，李春陽的警策與細察，近乎張愛玲發掘人性瑣屑的文學敏感：材料，特別是語言改革的官方權威史料，處處給她看出無所不在的似是而非，包括逾半世紀之久被置若罔聞的大錯大謬——如政治和語言、語言和政治的同一性——論文開篇，李春陽即截取國家辭典關於白話文運動的大段明文，從容拆卸，分段究詰。此後，本書與材料的關係難分難解，形同語言和語言的辯論。

然而白話文運動的政治性格，並非本書的要旨，而是期使語言問題歸位，或者說，作者試圖揭示：白話文運動的語言問題為什麼始終無法歸位——其間，語言問題的「正位」，于焉顯示：作為以上材料的遙遠對比，李春陽持續

接引先秦至清末的中國文論，連同歐美語言學觀點，在擴增材料中穿插並置，將白話文占據的現代史與前白話文運動的漫長語言史，縱向銜接，兼以西方語言學理論的橫向比照，展開多維的縱深與對話——準確地說，將之交付語言的對決——白話文運動的政治性格，以及，這場運動本應針對的問題，因此獲致必要的分殊、有效的平衡。

這時，良性的悖論出現了：我不敢判斷年青的作者是否古典語文的飽學之士，而我無學，僅讀懂小半。但是，極度荒謬而親切地，在我不能懂得的古典引文中，我從每一字句（包括不識不解的字詞）獲得漢語的歸屬感：一種不再為我所屬的歸屬感。我不得不由此確認，自己是白話文運動的隔代子民。

所有書稿期待辯難。對於本書，則今後的辯難者恐怕先要面對的是官方材料與國家文本。換言之，僅就李春陽目前所能收攬歸置的新舊史料，這篇文論即難以撼動。即便剔除文中全部觀點——如上述，其中逾半觀點已在材料與材料的關係中自行呈示——我們（至少，就我而言）對白話文運動，對白話文的認知，足以被這些材料有效地照亮、變更，以至顛覆。

我所感到最為窘迫而富有興味的是——這興味，處處來自真相的豁然——我從此不再信任白話文及其種種權威論述。但是，我屬於白話文，就是白話文。我與本應歸屬的中國傳統語文（包括上溯宋代的舊白話）以及這份遺產所能蘊藉的全部文化，早經中斷線索——除了簡體漢字，還有，喧嘩至今的現代白話文——我相信，五四前輩奮然爭得的所謂白話文，根本不記得李春陽攤開的這些舊材料，一如這場大獲全勝的語言革命，成功取消了古典漢語的漫長記憶：到今天，中國語文只剩了白話文。

現在可以理解本書的冒犯與危險：它針對今日人人使用的語言。當李春陽決意走出學術，即越出了安全線——議論這份犯難，也很難。

五四及今，九十二年過去了。從鴉片戰爭算起，文化轉型、國家轉型則過去一百六十多年。其間多少大事，如所周知，在當今的學術語境中，一面，亟待史料見光，重作評估；一面，做不得，太難做，便是做了，也做不深透，做不開。若干曾經犯忌的題目，如北洋史研究、民國研究、抗戰研究，兩黨兩岸關係研究，包括延安整風研究，反右運動研究，文革研究……早在做，正在做，有人做。當援引資料、觸探問題時，學者們所能把握的政治尺度，主動囿于學

界、位于邊緣，求取大致的安全，可就學術的名義自我維護，並獲得維護。時間的長距離已向當今學術研究展開逐漸可為的空間：要之，這類富含當代價值的歷史研究畢竟是在處理過去的是非，多少享有學術的超然。

唯獨追究白話文運動，無可超然——白話文運動，是歷史舊案，白話文不是：涉及所有人、占據所有文本，白話文的書寫言說，自動處于歷時狀態，既指向問題的起始與根源，也自動處于現在時。

明面上，白話文運動研究無關政治禁區（雖然處處照見權力的淵藪），也不是歷史與思想史（雖則在在觸動思想與歷史）；看內裏，則白話文再怎麼弄，漢語還是漢語，漢字仍是漢字，是惟中國才有的語言和文字，有這語言文字，于是中國叫做「中國」——李春陽的冒犯，是追究漢語便即牽動中國的一切。前引清末鄧實的那段話，或可視為嚴重的警告：不論今人是否同意、是否明白，無妨放下權力的傲慢——即，白話文一統天下的當然傲慢——冷靜想一想。五四一代的激忿、焦慮，早經遠隔，如今再來想想前清士子的話（那些話，亦曾被視為舊勢力的傲慢），可就完全不一樣了。

民初的白話文運動，是本書的主線，但不是主旨。白話文運動的研究專著，層層疊疊，今李春陽弄這數十萬言，攤一大堆材料，其實並非與學界辯難、對學者說話：我是讀到後來，後來再細讀，這才看清書稿的這股清正與蠻勁，指向所有人的精神處境，這處境，難有別種指歸，具體說，便是實實在在的語言處境——猶如檢視細胞而非病的診斷，李春陽試圖清點而究詰的問題，涵蓋文化與文明的基本單元，占有每一位言說的個體，直指今天。易言之，但凡歷史研究因遠隔歷史而被天然賦予的安全感，被這份書稿撤除了。

白話文運動之于傳統中國（亦即文言）的威脅，也早經撤除了：它的勝利，被公認是新文化的奠定，其對應，猶如新中國的創建——當年運動的肇事者，胡適、陳獨秀，即便不再是共和國名冊中的前世罪人，也被新修的國史唾棄很久了——繁體字，豎排本，悉數移去港臺及海外，新中國不再有一份書刊承襲完整如昔的漢語形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明令禁止任何出版物使用繁體字。今天，所有再版的古文著作，嚴格說，不是原典，而是由簡體字排版、白話文譯注的讀物，今之所謂國學教育，則形同外語教育。總之，當年白話文運動的仇敵：萬惡的古文——出于半真實、半假想——從現代中國的語言譜系中，全面鏟除了，一如抗戰、內戰、土改、文革……悉數成為歷史名詞。我們有理由認

爲，白話文運動竭力撲滅的舊勢力，白話文運動惡毒描述中國語文的噩夢般的過去，統統消失了。

是這樣嗎？是的，除了白話文。近百年來，可能沒有一份革命的覆蓋面、有效性、滲透力——不論是災難抑或福祉——如白話文運動那樣，在中國形成具體而微的歷時性後果，恒久生效，人人有份。爭戰、暴力、運動、鎮壓……那些顛覆歷史的現代往事，固然改造社會，改造人，然其侵蝕毀壞（或曰除舊布新）的深巨與久長，均難和語言革命相詰抗：現代白話文，一種被極度人爲所改變的語言，字字句句，反過來塑造人，置人的種種可能與不可能，于言辭、書寫和思維之間，遍布國民教育的每一階段、每一層面、每一角落，形同語言的水土與空氣。

這是五四文化激進主義最富活力的一份遺產嗎？它超規模繁殖，無可計量，你開口說話，下筆寫字，你就是影響與被影響的一環，證據是：你習焉不察，同時，別無選擇。

當今古典語文讀本及所謂「國學教育」，對白話文既不構成絲毫威脅，也無能襄助：足以平衡語言生態、行使語言辨識的大統：中國古典語文（包括上溯北宋的白話文），不復存在。現代白話文，自然而然，鑄成每一位使用者的日常獨裁，並被獨裁：沒有監督，不受制約，無須檢測，自行關閉了語言的出入與生機，如白話文運動詛咒攻擊的千年古文，停在超穩定形態，雖生猶死，然而空前肆虐，如問題百出而運轉如儀的國家機器。

在可見而難以預估的未來，現代白話文看不到語言及語言之外的任何出路與挑戰——此書題曰《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事實是，現代白話文的真正危機，是沒有危機。

但在白話文運動時代，語言危機不但顯在，且因其顯在，而被過度醒覺、肆意誇大了。迎對清末民初種種危亡意識，胡適一群新黨獨取語言文字的大關節，相率造反；而魯迅試以「最黑最黑的毒誓」詛咒文言文，又是何其怨懟——現在，百年後，卻有李春陽單獨一個，沒有契機，沒有同志，除了冷卻遺散的歷史文本，不具任何可資借助的時勢，居然在白話文運動九十多年後，放膽抖開運動的舊案，死命咬住，百般糾纏：她與胡適一樣，意在掀動當年文化叛徒群相標舉的命題嗎？

我願貿然斷定：這份孤膽遠遠超乎五四前輩的集體勇敢。猶如觸動歷史的

鐵案，李春陽在做一件不可能之事。

百年前做同一件事，則非但可能，而且聚眾，標舉國家民族的大蠹，其勢洶洶，彙通後續不止的其他革命與其他勢力，果然將兩千年以上的語言大統，合力扳倒了——被這洪流無情玷污的名字，包括白話文運動的所有主事者——白話文運動贏了，傳統漢語的降伏、衰竭而敗亡，是中國語文的新生，抑或歷史終結？相比今日李春陽這篇孤零零的文論，胡適們當年實在有福了：白話文運動曾經悍然招致無數舊黨與之辯難，辯難雙方，乃成全一場角色相當而聲色齊全的大革命——百年後，漢語生態毀損殆盡，白話文勢力，經已強大到不必稱之為勢力了。

一九四九年迄今的白話文，不是學術問題，而是霸權問題，這霸權，猶勝于五四一代攻擊的中國古文所曾占據者。當白話文運動展開之際、推進之時，如魏晉、唐宋、明清文人之于時文的痛詆或反撥，有沒有呢？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如有語絲派、論語派、學衡派，及梅光迪、胡先驕、周作人、吳宓、廢名、李長之（更不必說章太炎、嚴復）等人，均在胡適派之外，先後給出豐富的見解，魯迅之于古文的姿態，則呼來喚去，情狀奢侈而複雜……一九四九年至八十年代末，白話文進入文化的昏厥期、凝固期，整整四十年，白話文未聞一句拂逆之言；迄至九十年代，知識界略微醒覺，始有若干學者有感于時文的荒敗，歷史的疑點，乃訥訥為文，有所辨析，是為白話文運動半個世紀之後，稀散零星的質疑之聲。

就李春陽的材料所提示，九十年代以來，內陸學界先後曾有鄭敏議論文學寫作與母語問題、許明議論語言革命與意識形態關係、郜元寶檢視文學語言的古今之別與精粗之別、陳方競延展張灝關於「承續和斷裂」的論說、陳平原追述嚴復、王國維、章太炎在古語和新學間的貢獻、陳來揭示文白之爭與文化激進主義的淵源……這些議論，或此或彼，點到白話文運動的若干疑點及局部遺患。

此外，老一輩語言學家如呂叔湘、徐通鏘等，則以相對超然的立場，冷靜研析白話文：前者的重要觀點是將現代漢語歸入近代漢語範疇，「近代漢語」，係指唐五代以來書面漢語的連續體；後者，乃對應西方語言的「音本位」，整合國內語言學前輩（包括趙元任、王力、陳望道、張志公、朱德熙、陳承澤）的相關見解，平實申明漢語的「字本位」概念。

較五四前後的言論空間與爭鳴維度，今日的學術言動雖難項背而望，但

上述觀點畢竟是書稿史料中時段切近、猶富理性的部分。可嘆如今學界既是有限的議論空間，也是有效的消音系統，以上議論雖無全般質疑白話文的意思，然亦應者寥寥，刊行之初，略有小議，旋即歸于默然，便在圈內也難發生響動——漫無邊際的白話文，當然，無動于衷：覆蓋一切而喪失生態，現代白話文問題早經越出學術與文學，當代小說、詩歌、理論、學術，只是被白話文全面統轄、深度支配的漢語文本之一小部分。

是故文白之爭的餘緒、文學創作的語言、歷史人物的再評價、激進主義的舊是非……不是本書的焦點。作者的視野與關切，是在現代中國的語文——亦即白話文運動的總後果——所能涵蓋輻射的全息景觀。在這景觀中，李春陽的大面積追究，既針對五四前輩與新中國語言革命，自亦囊括當代學者和她自己在內的所有寫作及其語言——書稿題旨的所謂「危機」，非指五四那場運動，而分明說得是今天，一如九十多年前的語言革命，指向歷代群儒、朝廷群臣和所有讀書人。

話無須說白，也說不下去。總之，一九一五年，有來自美國康奈爾大學中國留學生的一篇短文《文學改良芻議》；二〇〇九年，有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的一篇長文《白話文運動的危機》；易言之，一個瀕臨崩解的文言文的舊中國，是白話文運動的總背景；一個日益富強的白話文的新中國，是本書的總背景——由時間此端遙看彼端，今李春陽的文化劣勢，無可對應，因而，無可同情。有如強大的敵陣，當年，是文言文成全了白話文運動；現代白話文，則自我滅絕了任何異端，它的敵方，它的病竈，它的致命的根源，是白話文自身。目下，國中學術的權力網絡，準確地說，權力網絡中的所謂中國學術——其編織與肌理，全部是白話文——會如九十六年前新黨舊黨群相虎視《文學改良芻議》那般，正視本書麼？

此所以我願斗膽指明李春陽的這份勇敢：它不是吉訶德式的勇敢，而是萬分真實之事。

《周易》與先秦諸子的「修辭」，為後世建立了「文教」。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前，這「修辭」與「文教」在當時整體文化語境中仍然存在，也仍然有效——白話、文言不過是語體的差別，二者使用的漢字，幾乎每一個同樣古老。

這段話，引自書稿尾章《修辭思維與寫作倫理》。我不想依從今時的濫調，將這份題旨說成全篇書稿的「關鍵詞」，但李春陽所以有此書，便在這末一章的矜矜告白。其中若干段落，理致平正，語氣則慨然沈痛。以下摘錄的段落不為說理——以為不值一駁者，想必勢眾；有誠意的讀者，自當閱讀全文——意在正視李春陽摯愛漢語的耿耿之心，我深度認同本書的理由，不全在文論的理致，而是這份摯愛。

此下且看李春陽對漢字與白話文的關係，如何陳述：

即便白話文運動爲了新時代而蓄意造成文化斷裂，白話文所使用的每一字依然是漢字，凝鑄于漢字的所有文化符碼和信息作用，不可能在同一個字裏被支解、被排除。沒有漢字，我們無法說話作文，每一漢字會自動堅守其意指及其界限，換言之，當白話文試圖重組漢字，猶如車道脫軌，被錯置、或被濫用的一系列漢字（歐化，以及外來的語法加劇了這種錯置和濫用）會拒絕執行清晰正確的文句——不幸的是，無數白話文正以災難性的錯誤，書寫大量不堪卒讀的文章，在表達、溝通、教育、傳播中留下無可估量的連鎖後果……白話文意圖擺脫文言，或誤以為與文言了無干系，是一種語言的錯覺，同時，成爲一種充滿錯覺的語言。

現代白話文乃是「充滿錯覺的語言」？好大膽的說話，但我無能反駁。倘若我們多少讀過幾句古文，又指望以白話文寫出清通的文句，並被清通地閱讀，則作者指稱當今市面上「大量不堪卒讀的文章」，便是一句平實的話——細想，則萬分乖謬：

今天，我們要拿漢語漢字的一字一句完全當漢語漢字對待，已很難做到。絕大多數人既沒學過語法也不通外文，卻用「印歐語的眼光」或一種莫名其妙的語言觀看待漢語，一邊使用漢語，一邊又不把漢語當作漢語，這種現象每日每時在發生，我們不必出門，打開電視看看聽聽，漢語就是這種狀況……

「一邊使用漢語，一邊又不把漢語當作漢語」，哪位當代白話文作者願意坦然承認不尊敬漢語、不懂得修辭麼？

修辭思維絕不僅僅是文句詞章之事，所謂思想的重估、道德的重建，

終究歸結為語言、歸結為修辭！《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諸如文風、格調、觀念，甚至包括全球化、經濟危機，人權狀況，個體權利意識，法治，政治制度等等命題，能否獲致精確而豐富的闡述，在在取決于修辭思維，脫離修辭思維，什麼問題都難免于空論與誤談……近來「普世價值」之類話語，惟修辭之善，可得超越，因「普世」云云，原亦不過修辭而已。

是的：「不過修辭而已」，這是致命的話——到了本章，李春陽取「修辭」發難，對白話文運動，對當代白話文，開始凜然側視：

或許白話文本身就是一個被無限放大的修辭，假設它的宏願是另立文教——其實亦屬妄想——漢語的詞彙還是那些，漢字的絕大部分是傳承字，簡化字不過是繁體字拙劣的替代品……新興白話文批判文言文，急于宣布舊文化崩潰了，為白話之必然取代文言，預先設置了意識形態神話……白話文運動的嚴重失誤，是使白話寫作與文言和舊白話為敵，不肯植根于漢語的字詞和語源，久而久之，既喪失修辭思維，也不知有修辭思維。出離漢語規律的白話文，唯委身于政治。

莫說「文教」——「文教」一詞，久已失落，今幾人識得、幾人在乎？——而「委身于政治」的白話文（即「意識形態神話」），經此劫持而催眠、復由催眠而發昏，乃大規模「出離漢語的規則」。這是白話文運動的正果嗎？這就是今日的漢語和寫作：「既喪失修辭思維，也不知有修辭思維。」後一句，更為可悲——以歷史的立場看待語言，曾為白話文運動所標舉；以語言的立場看待歷史，即本書的要害：為等待這份語言的立場，九十多年過去了。

「歷史」一詞，或也出于「修辭」吧：在五四以來的語境中，「歷史」其實意指政治。不是麼？自來白話文的倡導者辯護者，撮其要，莫不出于歷史的大立場：所有現代中國的大事件，包括白話文運動，從來被要求「歷史地看待」——西語的說法，即以賽亞·柏林痛詆的所謂「歷史必然性」——讀李春陽排列的「正面材料」，當初白話文悍將的大道理，說來頭頭是道，萬般確當：歷史到了危亡關頭，豈可死抱著萬無一用的古文！連當年舊黨為古文辯護，也多出以歷史的名義——其間秉承理性者，則于歷史考量之外，一再返顧語言的立場，

如昔時的章太炎、梅光迪及近時的徐通鏘輩。他們親歷歷史的脅迫，歷史再嚴峻，國事再切迫，他們仍然試圖申說：語言終究是語言，語言從歷史中來，語言就是歷史——這裏所說的「歷史」，則是「歷史」一詞的本意了。

現在，李春陽試以語言的立場所針對者，既是白話文運動全盤否定的中國語言史，也包括白話文運動裏挾其間的歷史——不論白話文如何、古文又如何，漢語自身的歷史，理應置于其上。

「白話、文言不過是語體的差別，二者使用的漢字，幾乎每一個同樣古老。」換言之，白話文、文言文，都為做文章，都能做文章。李春陽苦苦提醒、反覆舉證：清末的語言舊黨如林紓章太炎梁啟超，俱為思想的新黨，是中國第一代傳播域外新學問、新觀念、新文學的革命家；而通行未久的白話文，照樣速速演成語言的八股、文章的套路，喋喋不休，織成意識形態的大羅網，其負面，尤甚于古文所曾被詆毀者。

這便是語言的悖論——也是語言的能量：

從一開始，白話文運動就與晚清傳統白話刻意區別，其實出于漢語的自為性質，舊白話會自動跟進並融入新白話，因為漢字原本深具調節功能，舊白話之脫胎于文言，即是古例。毛澤東文體由文言而舊白話而新白話的如意轉換，也是一例。舊白話因遠離主流話語形態而獲晚清文士如梁啟超等青睞，也是今日之所以出現非政治化語言環境的內在原因。如果白話文試圖擺脫危機，第一步，就是放棄文白劃分，把白話文納入漢語修辭的正途，以語言的整體立場看待漢語、整合漢語。

「晚清的白話傳統」，上溯北宋，淵源久長，民初一代不是不知道。刻意抹殺文白的對立，已不是語言的立場。一九四九年後的所謂「語言的整體立場」——倘若曾經有過這立場的話——則如前述，無非政治意圖，政治立場。其大門面，或曰大修辭，即是歷史：時當清末民初，誰敢逆歷史而動？以歷史的名義，五四運動及其後續革命所要中國捐棄的大代價，首推中國的語言。

如今要來「放棄文白劃分」，可能嗎？文言沒有了，何來劃分。當初的理由，視語言為工具，白話文易學易懂，自然用白話文。但語言僅僅是工具麼？

哲學、科學、政治、學術、教育、文學，字字句句離不開語言，並

取決于語言，但在哲學史、科學史、政治史、學術思想史、教育史和文學史的研究中，語言的位置是次要的、曖昧的，仿佛這些研究不使用、也可以不考量語言，然而每一領域的學術文本——知識系統、理論闡述、概念的界定等等——自始至終形諸語言和文字，遍布修辭的期待與介入。任何一篇科學的或者政治文論，其對錯高下，難道僅僅事關科學學理或政治是非，難道無關乎語言，無關乎理知被如何表達，如何呈現麼？

這等明白的道理，久已為各學科所摒棄而相忘——近年花樣百出的所謂「國學熱」，迄無道及語言。今日的童子初讀國學原典，但凡識得字詞，朗聲一讀，道理未必懂，已得修辭之善，領受語言的美感：「道可道、非常道」，是理，也是語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為知」。是理，也是語言：不是這樣的語言，何來國學。

修辭之為修辭，必慎待語體，計較文體，孜孜于句式的營造，字詞的錘煉，咬文嚼字，換取風格，最終落實為一種得體的、優美的、有尊嚴的書面語……五四一代寫文章，白話正當創生途中，不論修辭功夫如何，以他們的舊學底線，尚能在文白之間作出選擇和調理。今時絕大多數寫家則惟餘白話一途。以如今的白話文而談論語體和文體，進而追究修辭思維，不禁起荒涼之嘆。

其實何必「語體」、「文體」，尋常交談，何嘗不涉修辭。此刻無端想起明人話本的四句話，是西門慶、潘金蓮被假定初會于宋代的問答：

不敢動問娘子青春。

奴才虛度二十一載。

小人痴長七歲。

大人將天比地。

這是白話還是文言文？是書面語還是口語？是俚語、大眾語還是國語？何必追究。直到我記事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滬上裏巷、窮鄉僻壤，還常親耳聽得長輩用了幾乎同樣的詞語和機鋒，一問一答、一去一來，知進退，守分寸，暗示明說，閃爍語言的活潑與狡黠。在市井村野未被現代白話滲透的二十世紀，

甚至「文革」初年，這類日常話語仍未根絕：在南方，在我落戶的山鄉，目不識丁的婦孺一開口，分明是前朝的舊白話：稱青年為「後生」、稱俊美為「標致」，稱可憐為「作孽」……

語言文字兼具天然的保守性與活躍性，保守，是因一民族的語言必與這民族的歷史同樣長久，不可率爾更動；活躍，是因語言永遠繁忙，渴望被使用，人人用，時時用，無一事不用，又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理由使用。當語言的保守性與活躍度被強行改變、強行抑制，語言進入既被動又任意的狀態：它不再聰明，不再主動尋求語言的機會，修辭變得多餘；它又被輕率地，有時幾乎是無羞恥地濫用，無視語法，或者，夾雜太多外來的語法，不忍卒讀——這正是新白話日益貧薄荒敗的根源。

這段描述，準確而緊要。荒敗貧薄的寫作，不忍卒讀，粗暴乖張的說話，不忍卒聽，而今時的寫家讀者、說者聽者，不覺有異。是的，「不再主動尋求語言的機會」，語言必定失去知覺，「不再聰明」——更糟的是，自作聰明，「輕率地」、「無羞恥地濫用」語言。對應《水滸》那對妖男魔女的初見，今時北大清華若干教授私下與同行打照面，「語體」如何：

你哪兒的？我的書讀過沒有？

這甚至難說是一句「問話」，聽來與今時任何門房、保安、信訪辦科員的說話，沒有兩樣。某位學者初來京城，飽受學界日常話語的侮辱性「洗禮」，向我訴苦。但他怎樣表達自己的反感呢：「你不知道啊，都這麼說話，牛著呢，一個個都很牛！」——「牛」，也是「活躍而繁忙」的語言之一例吧，而今忙著活著的，是只剩偉大的白話與白話文：

過去百年來，白話文運動成功地使今日絕大部分中國人不識文言，也不會使用文言，識了白話，也未見得寫好白話。文言、白話，曾經並存千年，主從尊卑，自然而然。文言依憑豐富的字形彌補字音的相對貧乏，與此相應，中國人的認知經驗，目治重于耳治。歷史演進，白話趨時，是情理中事，晚清白話文運動是此一趨勢的加速，到了五四文化激進主義，整套意義系統驟然更替，白話文運動的震蕩，至今猶在。白話的絕對優勢，已不可逆轉，文言作為漢語的精

華與有效性，除了古文專業而外，幾蕩然無存。

據李春陽告知，今日極少數專研古文的中青年學者，深藏古籍之內，不讀五四文章，更不讀時文。但這不是語言的生態，而是白話文帝國的微型孤島，是古文尚未死絕的微喘餘息，雖非「無存」，卻已「蕩然」，決不是活的語言場，猶難滋生精美的語言，更未推出高明的寫家。

白話文勝利了。今若干喜好文墨、追慕經典的青年書生，倒也試著寫那麼幾句文白摻雜的詞語，全篇文言的短章，也未絕迹：前些年南京高考狀元的「文言作文」即是盛傳一時、旋即忘卻的個例；而八零後記者的手機短信，也常以連連「頓首」收句，引以為雅，雖「雅」得可憐，渾然不知其錯——自宋及清，及民國，識文言而用白話，乃平常事，用得精彩而怡然，便是上引潘金蓮西門慶的問答；今天，會用且用對文言者，即便心誠意正，也落得一個奇怪的異類，不免做作之態、乖張之嫌。這類形迹可疑的語言「返祖」現象，並不能視作語言的機會，半點無助於語言傳統的起死而回生，惟反證一件事：白話文勝利了。

自從革命以其粗暴性格闖入漢語，強求漢語，漢語從此失去斯文，又在失去規範的同時，被剝奪自為的餘地……寫作倫理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幾乎不是問題：它消失了。多少以作家自居的人口口聲聲要為社會承擔責任，卻對文字極端不負責任，下筆之輕率、粗暴，趣味之粗鄙、平庸，從文字開始即取消了他所宣稱的價值。難以想像，一個造成文字災難的人，如何造福於社會。顧彬說「中國作家語言水平太低」，這話初聽荒唐，然而任何國家，作家都是指那些善用語言，精通語言的人。倘若一國的作家而語言水平太低，豈非惡夢。

豈是漢語失去斯文，便是「斯文」一詞，也已失落，億萬人口行事說話而閃過「斯文」一念者幾稀。域外文如德國顧彬的批評，其實要算斯文的，記得此言一出，本土文壇的愕然與驚怒，即大欠斯文，而回應此說的文章，我約略一讀：何談修辭。

「凡是成功的修辭，必定能夠適合內容複雜的題旨，內容複雜的情境，極盡語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覺得無可移易，至少寫說者自己

以為無可移易。」（語出陳望道《修辭學發凡》）此「無可移易」一句，正是修辭學要害，修辭之所以是修辭，一如字詞之所以是字詞。白話文的大病與通病，即不知一字一詞須得不可移易。

其實當今漢語「不可移易」之辭，並非沒有，而且多得很，惟其「不可移易」，而成大病久病，以至無望治愈的頑症——拿起報紙，打開電視：「各級領導必須重視起來」、「進一步加強落實各項基本工作」等等等等，就都是——如何移易？豈容移易？于是天天講、年年講，倏忽六十年過去，無可移易。清末鄧實憂心忡忡在茲念茲的「中國語文」，如今便是這樣一種語文，誰敢說，這不是「保國保種的金城湯池」？是故李春陽以下數語，也可句句反證今時的語文和中國人：

人的思考的密碼，乃是語言，語言，豈能離開字詞。知識系統、價值系統，不但和言語密切相關，而且起于語言，體現為語言。

是的：「各級領導」的話語，正是當今中國人的首要「知識系統」乃至「思考密碼」？「進一步加強落實」云云，則是政權竭力守護的「價值系統」。這一切，在在「起于語言，體現為語言」。固然，李春陽的意思，不是這意思：

人的創造活動，俱皆歸因于如何使用言語，或者說，莫不以言語求得理知，求得闡釋，最後，語言作為現象，行使觀察，也被觀察。教育，意味著從無量的書面語獲得無數資源，豐富言說，擴大存在的幅度、維度，以及，人性的深度。

而當今白話文的「創造活動」是在求得權力，求得控制。控制既久，早已塑成當代中國語文的「幅度」與「維度」，更兼受惠于「各級領導」年復一年的「加強落實」，今遍中國的知識結構與思考模式，早經層層圈定，形成國人的另一層「深度」，或曰「淺度」，年深月久，已如文言文和舊白話的幅度與維度，塑造了那個消失的舊中國。

白話文運動作為中國二十世紀最為龐大的修辭意圖——這意圖本身早已實現為龐大的事實——既是知識建構，又以此建構新的權力。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毛文體，確曾致力于新興知識的建構……這一時期，毛話語的訴求之一是民主，與五四價值和共和理想相呼應……一九四九年，新的權力結構終告達成，長于說理而擅于攻心的毛文

體，一變而為權力話語，政令與批判成為毛文體的大規模修辭實驗……權力話語猶如怪獸般脫胎于知識，實施知識的否定。「文革」，乃是權力踐踏知識的狂歡……

讀解毛時代的毛文體，今已不算太難——雖說仍未解、仍待解——難的是下文提及的語言現狀：這現狀，很難說是毛文體的「形變」或「泛化」，「加強落實」之類，論文采，論修辭，論蠱惑力，遠不及毛文體，然其陳腐之狀、泛濫之姿、流布之廣、統御之效，則為昔時的毛文體所遠不及。

在今天的語言現實中，要麼是以知識制衡權力，要麼是持續毛文體的形變與泛化，以權力掌控知識；前者是知識權力，後者是權力知識，欲求知識與權力的良性互動，端看我們對二者的認知，以及，能否將權力還給知識，將修辭還給語言。

是的。今時中國的語文——不論何種類型的寫作，不論為何而寫、為誰而寫——多麼需要新的修辭，然而沒有；多麼需要知識的權力，然而不能。知識應有的權力，眾人得不到，于是無權無勢的人滿口權力語言；語言應有的修辭，眾人不曾，亦且不知，于是文理不通的文章勢成語言的泥漿。古文所曾富有的修辭，隨古文的消失，消失了。梁啟超輩及五四一代寫手之于文白之間的餘裕，今人更是休想——「喪失修辭思維，不知有修辭思維」的漢語，于是「委身于政治」：這是當今漢語難以展望的未來，也是現代白話文進退失據的語言現實。

白話文運動可能要對我們至今幼稚的理解力——也即可悲的語言狀態——負有責任。無所感應于西方文本的修辭手腕，其結果，只能是輕信與盲從，同時，流于淺薄的認知。時下國內主流話語的昧于修辭，大量體現為意識形態宣傳而遭遇心理抵制。昧于修辭者而被認作知識分子，是當今社會的常態，一如貧薄蕪雜的白話文，早已見怪不怪了。

「輕信與盲從」對應「幼稚的理解力」；「社會的常態」對應「貧薄蕪雜的白話文」。白話文運動曾經抱有偉大的責任感，如今的白話與白話文，承擔什麼責任？怎樣承擔？靠什麼承擔？除了權力性格，莫說責任，白話文作為一種語言、語體，可曾贏得當然的敬愛、起碼的護惜？

九十多年前，白話文運動惡毒攻擊文言文，然昔時的文士便知古文總得革除，語言不免革新，也還摯愛文言文、惜護文言文：那是歷史的遺贈，成熟的語言，但知善用，古文便玉成書寫古文的人。魯迅痛詆古文，算得激越，偶或弄幾段，文辭間難掩享受之狀；胡適儼然新派，老來讀古書、參古經，他已憬悟，並且說出：白話文運動後來成了一場禍——今世，人人都說白話文，誰人摯愛誰人敬、誰人知惜護？倘若愛敬惜護白話文，白話文便不會是今日的白話文。

人不愛自己的語言，語言便不肯施惠于使用語言的人。當代的書寫不再聰敏，市面的言說漸失生機，莫說西門慶潘金蓮的潑辣而斯文，如今撞見個會說話的人，已是稀有的福分，稍一辨聽，也不過黃段子或江湖語，惟較「加強落實」之類，略有人間味。據說，古語舊說而有所沿用、仍然奏效者，眼下流在中醫界、佛學界、書畫圈——雖佛界早經行政化，書畫圈更是分餅奪利之地——文界、學界，敢說精通而愛敬白話文者，大約有誰？能有誰？寫著白話文，不愛白話文，早已是文界的常態，讀到本書的觀點，倒會昂然起身，為白話文辯護吧。我讀到書稿材料中那些為白話文嚴正辯護、慨然說項的種種腔調，不禁想：很好，你主張白話文，你愛不愛白話文？你愛白話文，你想必懂得、應該懂得，倒來說說白話文的好，怎樣的好法，文章寫來，又該如何有招有式使用白話文——

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彩，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煉之金。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

各極「其度」、「其致」、「其造」，白話文怎麼說？「開闔奇正」、「百尺之錦」，白話文又怎麼說？注而釋之，說得像了，好看好聽、可感可用麼？讀李春陽上引王世貞《藝苑卮言》的段落，我竟起可笑可憐之嘆。我笑這腐儒的眉飛色舞得意洋洋，讀來如聞夢囈：今白話文蟻民誰曉得這一套？誰吃這一套！我猶可憐李春陽四顧時語的大荒涼，搬出這死滅的文言文，聊以為寄，據以辯難，其說夢之感，尤甚于王世貞。

古文喪失，不獨漢語的意義鏈斷失，語言的聲色，便即消褪，人和語言

的關係、語言和文章的關係，隨之亡失。這關係不失，于是人對自己創造的語言、語言對創造自己的人，彼此有愛，往來有靈犀。精彩的文白相間、上好的白話文章，自有新的聲色，新的意義鏈，新的可能性，新的好辭章。可是那樣一種新語言，好語言，惟在清末民初那一代，如梁任公的恣肆雄辯，如周氏兄弟的潔淨而沈穩……彼時，白話文運動雖已鬧起來，文白固有的血脈，尚且交融，文白間的往還，猶如姻親——事到如今，選來選去反覆讀，近百年的好文章、好寫家，還是清末民初那些篇、那幾個人。此後半個多世紀，失去愛敬的白話文降得住幾篇好文章？

此所以李春陽要來披頭散髮，成六十餘萬字，由白話文運動從頭說起吧。其發難的勇氣，只因摯愛漢語：這大愛，表之于頑強的質詢，寫到本章，忽而轉為近乎母性的，準確的說，對母親般的，那樣一種愛：不容褻瀆，義無反顧，又如失母的孤雛，無可寄。此是稀奇之事，同時，極度嚴肅——怎樣才叫做愛國？你愛這國家的什麼？倘若愛國而不知愛這國家的語言，愛國一說便是大欠誠實的修辭，如泛濫無際的白話文，成一句空談，等同謊言。

也巧，近日收到如下一份過時的網絡短訊：

二〇一〇年六月七日，教育部前發言人王旭明在微博呼籲設立「語文節」。他說，年年高考，先考語文，可見其重要。建議將每年這一天定為語文節，每個中國人想想自己會寫文章會說話嗎？尤其當下五種人該想，該以反思的形式過語文節：一是語文工作者包括教師記者編輯等，二是各級各類官員，三是各級各類所謂發言人，四是翻譯，五是為人父母者。我感覺這五類人中會語、會文者少！

卸任官員的「呼籲」，本不必認真，網友讀過，頃刻忘記。而急不擇言，慌不擇路，竟給出這份藥方，也算中國當代語文抽樣之一吧：「語文工作者」，標準四九年後的白話官腔；語文的重要居然因「年年高考，先考語文」，則對照清末鄧實「語文文字關乎國之存亡」，簡直霄壤之別。稍可認真者，是所謂「五類人」語文不行，如此，今遍中國的語文是何等語文？

九十二年前，北洋政府明令禁止文言文教學，尚有決斷與自信在，此後，文言文果真到了末路——直到被白話文活活弄死——九十二年後，有政府教育部前官員弄出這不倫不類的「語文節」動議，則白話文之途窮，昭然若揭。

這就是漢語的命運。一紙禁令，千年文言；「語文節」動議，百年白話文。前者迫于國難，雖粗暴，尚有文化轉型的痛感在，後者徒託空言，迹近玩笑，想要嚴肅，無從嚴肅起。以下李春陽的感喟，是屬懇切：

白話取代文言，是極其複雜的精神、社會事件，深涵中國近代以來，甚至千年以來的文化矛盾。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對決，改良和革命的消長，啓蒙與救亡的衝突，保守與激進的起伏，全盤西化和保存國粹的對立——單一角度、單一學科的析評，不足于解讀這一事件的全部複雜性及其影響。

這番話，確是議論白話文是非的大難。何止單一學科無以應對，單一國度的事相，也須持論審慎：白話取代古文，非僅中國的語言官司。全球範圍現代化、工業化、大眾化、商業化，語言興替的需求，語言變異之疾速，各國皆然。拉丁文、古英語之在歐陸與英美，歷史典籍之在中亞、印度、日本，境遇類似。亞洲地區，則各國國粹與西化、保守與激進、民粹主義和精英主義的種種語言劇情，其性質、緣由，程度的輕重、後果的大小，各相類似，各存差異，要來比較，怕要有另一篇大論。

上百年前，文言文被虛擬的絕境尚能從白話文窺見廣大的出路，于是起語言運動，今時，白話文若欲振作，靠什麼破局？向哪裏求生——在紐約，我長期旁看各族裔移民如何與母國的傳統相周旋，久而久之，未曾見任一民族如中國人這般，冥頑抱守民族主義，同時，怡然自安于文化的失據而無根，證之于語言，則種種民族主義的叫囂，無有一句是民族的語言。

原因無他：白話文，已是一種失憶的語言。這失憶，非指所謂國學——冷落典籍，非惟中國，不懂古文，無關宏旨——要害是，當今荒敗不堪的語文課只是識字，不再能稱之為語文教育：在絕大部分中國人、年輕人及未來一代代「炎黃子孫」那裏，這樣一種失憶的白話文，是沒有未來的語言。

但億萬人惟餘白話文，白話文不會死——三十多年來，國正當崛起，黨、政府、公司企業、各行各業、各色人等，語言需求空前切迫，語言市場無可限量。而經濟銳意前行，社會日夕變異，人心不復既往。明面上，惟體制事事掣肘，步步滯後；向內看，則語文實與體制同病，在超速巨變的時勢與國勢間，梗橫阻滯，呈大脫節而大錯位。更大的錯位是，億萬人已然適應了體制，在這近乎鈣化的漫長過程中——因其漫長，事屬被迫抑或主動，已難分清——中國

人所適應的另一巨大之事，無過于白話文：這一失去記憶的超級語言聯盟，經久釀成億萬國民的集體人格，這集體人格的單面性、平面感、空心化，無可挽回地趨向語言的枯竭，因其枯竭而加劇語言的耗損。每一個中國人參與了這場語言的災變式狂歡：初起，緣自革命年代的白話文，終于，實現為蕤蕤眾口的白話文。

人受困于語言，並為語言所反制，若欲掙扎逃出，求助者，仍是語言；反之亦然。毛澤東那代人所曾浸潤的漢語資源，大可調度，大可選擇。今我黨拋棄了毛語言，自亦連帶失去漢語的一大資源，縱有話說，卻沒有語言，遂循環咬嚼另一路陳腔、另一套濫調——此亦或可解作黨語言對毛語言的全盤失憶——這語言的絕境，除了政治的形格勢禁，內裏——有誰想到過嗎——其實是白話文運動的世紀報應。

這不是語言的危機、語言的歧路，而是，實實在在的窮途。這窮途，如何對應前路昭昭、大有餘地的國勢？媒體娛樂語言、商業廣告語言、學界文論語言、世俗人情語言、網絡流行語言……看似喧騰，花樣百出，蓋同出于長期黨化的單一白話文，為敷衍各各殊異的語言需求，惟支離挪騰，攪拌兌水，兌水而復攪拌，使白話文語體腫大起泡、狀若汪洋而已。這樣的白話文，實在連「語體」也難成立。即便零星異議的語言，無一例外，源自早經用濫而仍在濫用的白話文。

五四一代，曾將古文與文言文罵得一文不值，百般不堪。今李春陽獨自給白話文做此龐大的診視，通篇用的是政治正確的白話文——白話文可有迎對詛咒的氣量？我不很相信本書書稿果然能夠全文發表，便是發表了，今群起捍衛白話文的學術徒眾與權力陣容，可比清末的士子強大太多了。讀李春陽引述世紀以來有關白話文的種種辯詞，在在剛愎而強橫，但我仍願領教，白話文的辯士們還能吐納什麼新的大道理。

沒有用的。當初清人為古文苦苦辯護，是為徒勞——百年前，更大的是非，更大的命運，不肯停下來聽取文言的辯護——今天，福兮禍兮：白話文不存在自守自辯的語境，因白話文的植被和疆域，遠遠甚于古文：失去記憶的語言，勢必規則蕩然，無所謂自為自證，正因此，白話文空前頑健恣肆，休想有別種語體給它挑釁、威脅，或予襄助而制衡。放眼看去，日益潰散而同質的白話文，不具任何語言的層級、派別、質地、表徵——所有人只會說白話文，但白話文不屬於任何人。它甚至不再是語言，而是無關尊嚴和美感

的低級工具，全然交付權力，演繹為不同權勢的簡陋副本。

本書的要義，即白話文運動是由語言的權力蛻變為權力語言的歷史。眼下，如果白話文仍然形同政權，不容絲毫質詢，如果李春陽的觀點將被某一方（這某方其實並不存在，除了白話文）指為一組錯謬，則必定不會來自語言的說服力——即便假以學術還是別的什麼名義——而是，取決于言說它的權勢。這類權勢大抵是臨時的，輪替的，但不必更換、也不可能的更換的工具，是白話文。它保證權勢運行，卻無需保證語言的效能。語言的效能，在白話文那裏早經去勢了。

然而這篇文論難道不存有問題或錯失麼？或許有，但我不在乎。一如我不在乎本篇序言涉嫌無知而偏激：我願高聲說：當年白話文運動的大問題、大過失，何止百千倍——我們，包括「語文節」的動議人，倘若早經不安于當今的語言困境（說是「困境」，仍屬客氣的修辭）——李春陽的功績就在告訴我們：白話文運動究竟是怎樣一場革命，堂堂漢語，何以一至于此。

最後，我對本書的唯一意見，是嫌篇幅過于冗長——包括這份序——此即白話文。古文與文言，不曾，也不必周旋于這等長篇的官司：時代到底不同了。揭示歷史的「全部複雜性」，需要太多篇幅，太多篇幅，需要太多新的語言：漢語的能量、幅度、詞語、文類，確乎因白話文運動而大大拓展了。新的漢語的可能性（這可能性，其實大半來自百年以來的翻譯之功），空前豐富了漢語的言說與寫作——是的，被改造、被豐富的現代漢語，可以被稱之為「白話文」，但絕不僅僅歸因于五四前後啟動的白話文。白話文的歷史，遠及宋代，白話文的能量，本身就是漢語的能量，漢語的千年檔案，從來保有完滿自適的語言邏輯，只是料不到自己的命。

白話文運動的初衷，是消滅古文，解放漢語；但白話文運動所嚮望的語言未來，是不是今天這種白話文——凡同情歷史而敏感語言的人，可能會抱著兩種難以調和的心理：白話文運動是一場語言的災變，抑或救贖？今天，當我們下筆開口，理應對白話文心存警惕，抑或，對當初白話文運動的興起，保留一份有所保留的同情和敬意？

我因此贊同李春陽在完篇之際的二〇〇九年未曾定奪的副標題，即，獻給五四運動一百周年。

二〇〇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二〇一二年七月七日 寫在北京、霍州、紐約



目

次

上 冊

序 蔣寅

序 陳丹青

緒 論 1

第一章 什麼是白話文運動——對《中國大百科全書》

「白話文運動」詞條的症候式閱讀 13

第一節 白話文運動的背景 15

第二節 白話文運動的經過 28

第三節 白話文運動的成就 45

第四節 白話文運動的影響 60

第二章 白話文運動的五位先賢 65

第一節 白話文運動中的胡適 69

第二節 白話文運動中的魯迅 81

第三節 白話文運動中的周作人 98

第四節 廢名與李長之 113

第三章 白話文運動向何處去？ 147

第一節 大眾語運動 149

第二節 「民族形式」論爭 172

第三節 白話偏至論 194

第四節 白話的舊與新 215

中 冊

第四章 從立異到標新 241

第一節 「河南五論」 241

第二節 「老三篇」	258
第三節 毛澤東的寫作	289
第四節 舊詩與新詩	327
第五章 漢語文脈的斷與續	363
第一節 漢字與文言	363
第二節 古文運動與科舉	374
第三節 駢文與散文	386
第四節 簡化漢字不該倉促而行	398
下 冊	
第六章 言文一致問題	421
第一節 言文一致的由來	421
第二節 言文關係簡論	431
第三節 方言和方言寫作	448
第四節 口語和書面語的關係	467
第七章 漢語歐化問題	489
第一節 歐化問題的緣起	491
第二節 歐化諸現象分析	504
第三節 對歐化的評價	516
第四節 翻譯文體對現代漢語的影響	527
第八章 修辭思維與寫作倫理	549
第一節 西方的修辭思維	549
第二節 在修辭立誠和方便法門之間	571
第三節 著述傳統與寫作倫理	600
第四節 風雅久不作，何日興再起？	624
結 語	647
附錄 本書涉及的百餘年來語言文字及文學大事 簡表	649
主要參考文獻	661
致 謝	675